

2014 年全球经济治理学综述

黄薇 吴国鼎*

全球经济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顺应世界发展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经济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学科。全球化带动世界进入了一种新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即一种以全球广泛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核心的新型体系。^①全球经济治理正在从霸权治理向合作治理迈进。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提升对各国在全球层面加强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全球性经济运行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段,在全球经济治理定义以及所涵盖的内容等诸多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也仍处于探索过程中。

本综述涉及 110 多篇国内外学术期刊^②及全球主要智库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五个方面对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重要文献进行综述:首先是全球经济治理宏观层面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实践,该部分涉及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时代特征研究、全球经济治理的规范研究以及与公共选择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合作博弈研究。后面四个方面则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核心议题领域的研究,包括经济增长治理、货币金融治理、贸易投资治理以及其他重点领域的治理。这四个议题也是近年来二十国集团经济治理关注的主要方向。如果从权威期刊以及国际重要智库发表的文献数量来看,研究热度最为集中的三个方面依次为:全球货币金融治理(30 篇文献)、全球经济治理发展与实践(25 篇文献)、国际贸易与投资治理(25 篇文献)。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实践

(一) 国际体系向着扁平化方向发展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国际体系大致经历了四次大转型: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维

* 黄薇、吴国鼎,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信箱分别为 huangweicass@vip.sina.com, wuguoding@gsm.pku.edu.cn。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并自负文责。

① 王毅(2013):“试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制度建设”,《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

② 本文涉及学术期刊为:《The World Econom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China and World Econom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ational Interest》、《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亚太》、《欧洲研究》、《财贸经济》、《国际贸易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国际经济评论》、《国际金融研究》。

也纳体系的转型, 维也纳体系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转型,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型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一次转型。纵观历次国际体系转型, 每一次转型都意味着权力在体系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国际机制的重大调整以及体系内行为体数量和性质的改变。^① 从长时间尺度而言, 国际体系转型体现出三个明显趋势: 国际体系行为体趋向多元, 国际体系覆盖领域不断拓展, 国际体系的联系程度不断增强。国际体系的转型越来越复杂, 表现为传统权力逻辑的掣肘越来越多, 权力结构的扁平化趋势明显, 国际体系的规制能力不断增强。

1. 全球经济格局变化领先于经济权力格局

全球经济格局在 21 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总收入、出口增加额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② 这些现象引申出来的一个简单推论是经济权力格局也在同步变化。然而, 经济格局的变化与经济权力格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权力通常意味着拥有能够影响市场运转的能力和决定商品价格的能力。Agarwal & Samanta (2014) 对 20 个反映经济权力不同维度的指标进行加总处理并建立了衡量经济权力的新指标。依据这些指标的表现, 他们认为世界经济权力并没有发生重大转移。例如 1990 至 2005 年主要国家经济权力排名并无重大变化 (只有中国前进了 9 个位次, 韩国和以色列上升了 4 个位次, 加拿大下降 5 个位次), 2009 年的经济权力指标排名与之前亦无明显变化。而且, 尽管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位次越来越接近, 但接近的速度越来越慢, 而且在 1982 年之后几乎陷入停滞。^③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世界经济格局正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即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和以中国等新兴大国为中心的新循环, 新旧循环并存的结构。王跃生、马相东 (2014) 认为这种双循环结构既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实现。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南南合作”, 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区域一体化等合作形式促进新循环的发展。^④ 李晓、李俊久 (2014) 发现现阶段东亚权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混沌”特征: 单个国家通过逐次崛起或许在某个领域拥有一些相对优势,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确保在所有的权力结构中均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优势, 更未达到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在该地区权力优势的程度。文章还认为, 就性质而言, 东亚地区内的权力转移是个别国家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现象。^⑤

2. 结盟有助于增强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

除了国家间的权力角逐, 国家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通过结成联盟来增强治理的影响力。

① 唐永胜, 李冬伟 (2014): “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12 期。

② 1965—1973 年间,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收入增加额的比重不到 13%。20 世纪 80 年代, 这一比重上升到 25%。2000—2007 年间, 这一份额进一步上升到 40%。金融危机期间世界收入的增加几乎全部由发展中国家贡献。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从 2005 年的 46% 上升到 2011 年的 55%。发展中国家 FDI 资本流入由 2007 年的 26.9% 上升到 2009 年的 42.9%, FDI 资本流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③ Agarwal, Manmohan; Samanta, Sayan (2013).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and Shifting Economic Power: Is There Convergence. *RIS Discussion Papers* No. 184.

④ 王跃生、马相东 (2014): “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 《国际经济评论》, 第 2 期。

⑤ 李晓、李俊久 (2014): “美元体系内的东亚权力转移: 性质及前景”,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11 期。

结盟有两个基本功能：威慑对手与援助盟友。联盟机制的作用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复杂的机制设计来提高盟友的背叛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发出有代价的信号来威慑对手的冒险行为。尽管国家设置更紧密联盟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联盟的可靠性，但是由于国家在联盟中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降低成本的能力存在差异，使得联盟机制的影响变得复杂且有条件限制。^①

联盟维持与瓦解主要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战略利益、实力关系和国内秩序兼容性。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对联盟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国家实力的相对关系则影响着各国对于结盟合作价值和战略利益的认知。而国内秩序的兼容性则塑造了联盟的可靠性以及对于战略利益的认知。基于以上分析，宋伟、宋卓如（2014）考察了美日联盟、美欧联盟和苏南联盟三个代表性的案例，分析了这些联盟维持、加强以及瓦解的原因。^②从联盟身份认同的角度，有研究发现联盟成员的身份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意识，只要这种身份不会与潜在的经济考量相冲突。当集团成员的身份和经济影响确定的情况下，高资质的集团参与者将有助于形成相互的吸引力，而开展团队建设活动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成员的贡献水平。^③合作伙伴背景文化传统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会给多样化成员构成的集团合作带来了挑战，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条件。然而，以美国高校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伦理道德等碎片式的身份认同感所带来的合作动力要远小于在校身份所带来的合作动力。这一发现说明相对于以正义为基础的抽象性合作而言，结盟对于联盟存续的贡献可能更加稳健。^④

（二）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1. 区域治理能力影响其全球治理能力

在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区域型治理主体的重要性逐步增强。作为区域治理的典范，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践已经逐步超越了单纯的结构建设，开始迈向一套新的兼具内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为特色的区域发展政策集合。而这些政策集合的评鉴、导向和建构功能保障了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的实现。^⑤叶江（2014）通过考察欧盟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对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理解，认为欧洲一体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很高的契合度。欧盟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依据自身的经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期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增强影响力，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⑥

① 董祚壮（2014）：“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当代亚太》，第1期。

② 宋伟、宋卓如（2014）：“联盟的维持与瓦解：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2期。

③ Charness, Gary; Cobo-Reyes, Ramón; Jiménez, Natalia (2014). Identities, Selection, and Contributions in a Public-Goods Gam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7, 322 - 338.

④ Chen, Yan; Li, Sherry Xin; Liu, Tracy Xiao; Shih, Margaret (2014). Which Hat to Wear? Impact of Natural Identities 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4, 58 - 86.

⑤ 喻锋、孙卓忻（2014）：“区域治理如何成为可能：以欧盟聚合政策（2007—2013年）评价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⑥ 叶江（2014）：“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践及影响——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欧洲研究》，第3期。

2. 经济治理主体的多层级、网络化合作趋势

尽管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国家性增强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基础,与其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在实践层面上,全球各地区协同治理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虽然政府角色仍然不可替代,但是超国家、区域、次国家、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等治理层级责任已经嵌入到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之中,各类开放型公共政策的演化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或权的权能承接、关系协调和功能转化作用。

区域间主义作为特定国际区域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现象,已在区域、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多层次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先武(2014)认为,区域间治理的核心行为体、基础条件和可能路径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区域间治理研究的一种综合分析框架。^①

3. 小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有效发展途径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不只有大国或者其他的大行为体,还包括很多小行为体。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等小行为体得到空前发展。它们广泛地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在国际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宏松和钱力(2014)讨论了决定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关键变量,并解释了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国际组织中影响力存在差异的现象。其研究表明,非政府组织只有在其议题与国际组织的议题契合度高而且其本身属于服务型组织的前提下,才能够通过与国家合作在国际组织中起作用。^②从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的经验出发,魏玲(2014)认为在大国战略互信缺失、地区安全机制不足的情况下,小行为体建立并主导国际制度主要依赖的三条路径为:规范制度、网络权力与过程实践。小行为体通过将相关大行为体织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制度化网络中,来获得大国认同并获取制度化网络的权力。换言之,小行为体通过规范的本地化和过程的多重化来实现其制度化权力。^③

(三) 全球经济治理范式的研究

1. 国际规范的形成与其更替发展

全球治理必须在一定的国际规范下进行。国际规范通常以两种方式形成:要么采取一般性的理论规范作为指导,要么采用特殊案例做类比探讨。而采取哪种规范形成方式,通常取决于问题的复杂程度。简单明了的现实问题容易形成理论规范式的治理形式,而复杂问题的治理则会更倾向于采用类比方式。不过,当治理参与者数目较多时,无论问题的复杂程度如何,运用理论达成一致性的可能性更大。这也是诸多社会规范形成的主要模式。^④由于国际道德价值观的演变,引发了当代国际规范的更替问题。冷战后,日益泛化的安全概念和相应

① 郑先武(2014):“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

② 刘宏松、钱力(2014):“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

③ 魏玲(2014):“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④ Gayer, Gabrielle; Gilboa, Itzhak (2014). Analogies and Theories: The Role of Simplic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m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3, 267-283.

的安全化操作对此更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潘亚玲（2014）指出，中国需要明确自身在当前国际规范更替进程中的定位，进而全面界定自身对于国际规范更替的总体战略和具体策略。^①

2. 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国家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规范层面的一种体现，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在观念、定位、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两者相互依存，并藉由“良法”和“善治”两大法治核心要素实现有效衔接。而两者间持续的互动则是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统一性的基本体现。^②

国家利益和国际法体系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关系，这种关系与国际法的“道德进化”以及国际法自身的“国家合意之法”体现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法是大国间利益均衡的结果，也是小国保护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主要工具。^③中国与亚非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国际法进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战后新兴国家对新型国际关系法律基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是体现新型国际关系共性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其与联合国所致力建设的国际和平目标一致。同时，这些原则也是中国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和谐共生道路的基本价值准则。^④

（四）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性研究

1. 促进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体制保障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过去的研究已经指出公地悲剧可以通过动态博弈的大众定理来解决。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博弈均衡的实现其实与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关。在相对充裕的资源条件下，不合作的开发也能实现均衡；而在资源稀缺时，这种开发方式则会很快引致冲突。这种冲突即便不会浪费资源，也会降低参与者的效用水平。^⑤公共产品的持续稳定供给，需要保障一定水平的自愿贡献，并设立相应的惩罚机制。对惩罚机制的实证比较研究显示，对全体秩序违反者的制裁收益将等于或小于对最恶劣的违反者实施制裁，即后者的惩罚效果可能更好。而且，个体成员在立法制裁（正式的）和社会规范（非正式的）的影响下，会愿意去遵守这种非威慑性的制裁规则。^⑥作为新兴全球大国，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上，与既有大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既要增强自身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对接，使中国经济体制更能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的需要，提升中国对全球

① 潘亚玲（2014）：“国际规范更替的逻辑与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

② 赵骏（2014）：“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③ 刘志云（2014）：“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④ 苏长和（201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

⑤ Sekeris, Petros G. (2014).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a Violent World.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5 (3), 521 - 532.

⑥ Kamijo, Y.; Nihonsugi, T.; Takeuchi, A.; Funaki, Y. (2014).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Comparison of Centralized Punishment Institution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4, 180 - 195

公共品的供给能力。^①

2. 提升决策效率的有效投票机制研究

由于并不存在超国家的世界政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的决策通常采取一致同意的形式，此外也常采用以多数票为基础的投票方式。例如，在目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投票权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体现形式。但是，在对先验投票权力指数测算结果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实际决策权力不仅决定于投票权的分配情况，而且也决定于投票程序设计是否有助于形成集体行动。^② Masuda 等（2014）介绍了在公共产品提供决策中的最小同意机制（Minimum Approval Mechanism, MAM）。该机制分为两步骤：首先，每个投票参与者同时且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投票者同时决定是否同意其他选项。如果所有投票者均同意，则最终结果就是该选项；如果意见不同，则投票者只对首轮选择给予最小贡献。该机制实现了多重解决方案中的帕累托最优，同时还具有三个特性：直接性、自愿性和单调性。^③

理论而言，经济治理主体可以通过投票活动有效率地产生最佳的治理方案，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将导致非常不同的投票结果。通过对义务投票行为和自愿投票行为静态参数模型的比较，研究者发现投票者在不同性质的投票活动中其投票与真实意愿的一致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允许弃权的无成本义务投票活动中，投票行为往往是战略性的，并不能反映投票者的真实投票愿望。在自愿投票且有成本的投票活动中，投票行为往往反映着投票者的真实意愿。而在自愿投票但没有成本的投票活动中，只有当投票结果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均衡时，投票者的投票行为是反映着投票者的真实意愿。^④

二、全球经济治理之经济增长治理

（一）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1. 开放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更佳、经济同步性更显著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和政治稳定、社会进步以及发展质量等问题有着紧密联系。在对全球 128 个经济体在 1975—2012 年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后，张中元（2014）发现：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而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替代效应：对于封闭经济体而言，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非常显著；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由于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实现利益，因此经济增长

^① 裴长洪（2014）：“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经济研究》，第 3 期。

^② M. J. Holler, Nurmi, H. (2014). Aspects of Power Overlooked by Power Indices. Voting Power and Procedur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 205 - 219.

^③ Masuda, Takehito; Okaano, Yoshitaka; Saijo, Tatsuyoshi (2014). The Minimum Approval Mechanism Implements the Efficient Public Good Allocation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3, 73 - 85.

^④ Bhattacharya, Sourav; Duffy, John; Kim, Sun-Tak (2014). Compulsory versus Voluntary Vot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4, 111 - 131.



对政治稳定性的依赖相对较少。^① 如果把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分为高收入 OECD 国家、高收入非 OECD 国家, 上中等收入、低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等五组, Louis & Simons (2014) 发现世界经济衰退或扩张对于相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影响类似, 即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并不会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周期的同步性。^② 依据以贸易指标和对外证券投资指标为基础构造的经济联系紧密指数, 金中夏、李良松 (2014) 将 G20 的 19 个成员国划分为美国集团、欧洲集团、英联邦集团和亚太集团。这些不同集团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同, 发达国家之间呈现更强的经济联系。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提升, 但为了进一步提升在 G20 中的影响力还需要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能力并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③

2. 全球经济外溢性增强要求更好地进行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出现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区域内协作的日益增多, 过去几十年中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性大大提升, 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 尽管学者已在理论上证明了协作能够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好处, 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实证文献指出跨国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 且效应大小取决于各国的政策选择。由于国际经贸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升, 近期的迹象则表明跨国效应其实十分显著。实践中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政策外溢效果的规模和利弊评估难以形成共识。^④ 现有的理论模型通常聚焦在一国经济政策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 而对于外部经济的产出影响的关注不足。Bayoumi (2014) 认为在相对同质的国家间宜采取基于规则制定的技术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合作, 而在异质性国家间且政治含义较高的合作中, 则最好采用事后评估、相机抉择的方式。^⑤

(二) 关于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讨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经济治理手段和国际政策协调措施来提振全球经济。但是全球经济依然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中。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虽然有所好转, 但仍未完全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桎梏导致其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缺失, 再加上这些经济体国际货币权力的缺乏以及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使其遭遇短期金融冲击的风险上升。Schachter (2014) 列出了全球经济稳定面临的六大挑战: 中国内部经济的脆弱性、美国缺乏约束的财政政策、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缺陷、欧元区复苏与改革的停滞、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力减弱同时非代表性国际金融组织不断增加、全球经

① 张中元 (2014): “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 4 期。

② Jean Louis, Rosmy; Simons, Daniel. (2014). Business Cycles Synchronicity and Income Levels: Has Globalisation Brought Us Closer Than Ever? *The World Economy*, 37 (5), 592 - 624.

③ 金中夏、李良松 (2014):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利益关系研究——基于经济和金融角度”, 《国际金融研究》, 第 5 期。

④ Blanchard, Olivier; Ostry, Jonathan D.; Ghosh, Atish R. (2013). Overcoming the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Macro Policy Coordination is Hard. *VOX*. <http://voxeu.org/article/obstacles-international-macro-policy-coordination>

⑤ Pickford, Stephen; Bayoumi, Tamim (2014). 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peration Dead? Chatham House, 2014 Jun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cooperation-dead>.

济失衡。^①

1. 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与原因

更加令人棘手的问题可能是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阴影。现阶段对于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并未形成一致看法,有的学者重视十年以上的长期经济缓慢增长,有些学者则更关注金融抑制问题。^② 长期停滞的定义之一是只有通过负的实际利率才能实现储蓄投资的均衡,才能实现充分就业。“长期停滞假说”发现了新古典和传统理论的不足^③。近来有迹象表明,长期停滞将在美欧蔓延。当存在低通胀和政策利率零下限时,长期停滞将使得经济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美国的GDP产出水平比危机之前的预测水平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世界各国指数化的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在过去15年中呈下降趋势,均是长期经济停滞存在的基本证据。^④ Brink (2013)认为,一方面,生产率的停滞,将会抑制企业盈利能力,由此产生的投资不足又会拉低潜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长期经济停滞。当代的科技革命难以取得蒸汽机时代对于生产率提升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还受到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公、教育水平不足、环境保护影响、高企的政府与企业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⑤ Gordon (2014)认为以上制约因素将会在未来10年内将美国潜在GDP增速拉低1.2个百分点,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拉低0.6个百分点。^⑥

2. 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理论分析

在讨论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担忧之后,也需要理解经济增长失速的分析理论和经济政策选择。在经济萧条产生原因及其后果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哈耶克的资产清算理论和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资产清算理论认为经济萧条反映了早期过度投资导致的资产清算过程,也被称为“宿醉理论”(hangover theory)。总需求理论则认为萧条实际是总需求的不足,以致于经济缺乏动力开展交易活动,因此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政府干预行为是必要的。Beaudry等(2014)描述了经济复苏时间与资本积累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指出在资本清算机制中失业增加以及总需求不足也同步出现,即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两种观点实际是一体二面、互为补充。该研究认为萧条期间旨在刺激经济的干预政策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它会延迟复苏的时间。^⑦ Sachs (2014)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都无法解决经济增长失速问

^① Schachter, Claire (2014) Winter is Coming: Beyond the IMF – World Bank Spring Meetings, an Unfinished Battle for Reform. CFR.

<http://blogs.cfr.org/patrick/2014/04/11/winter-is-coming-beyond-the-imf-world-bank-spring-meetings-an-unfinished-battle-for-reform/>

^② Teulings, Coen; Baldwin Richard (2014).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VoxEU eBook). London: CEPR Press.

^③ 即认为无论政府是否实施干预,市场机制最终都会自动回复到充分就业状态,消除产出缺口。

^④ Summers, Lawrence H. (2014) Reflections on the New ‘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 VOX, 2014 Oct. 30. <http://voxeu.org/article/larry-summers-secular-stagnation>

^⑤ Lindsey, Brink (2013). Why Growth is Getting Harder? CATO Policy Analysis No. 737, 2013 Oct. 8.

^⑥ Robert J. Gordon, The Turtle’s Progress: Secular Stagnation Meets the Headwinds. In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edited by Coen Teulings and Richard Baldwin, pp. 47 – 60, 2014.

^⑦ Beaudry, Paul; Galizia, Dana; Portier, Franck (2014). Reconciling Hayek’s and Keynes’ Views of Recessions. VOX, 2014 June 1. <http://voxeu.org/article/reconciling-hayeks-and-keynes-views-recessions>

题,原因在于当代的私人投资属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受到低税收、低标准或创造需求来推动,而是更多地基于公共部门的投资表现。如果公共部门不能明智地进行投资,私人部分就会持续囤积资金或者干脆以红利的方式发给股东。^①

(三) 提振增长的经济治理政策选择

1. 经济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及可能存在的政治困扰

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经济治理活动的参与者与经济学家们不仅关注债务水平的变化,也关心经济体的潜在增长以及影响潜在增长的结构改革。有研究发现,政府未来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能力与经济体的风险溢价水平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5。换言之,如果政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则意味着提高未来的融资成本。通过对19个OECD国家的约40种不同指标的结构改革测度指标,Findlay等(2014)发现金融市场能够辨别一国采取的降低风险溢价的措施,能够反映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当一国采取促进增长的结构改革措施时,高的债务水平并不一定会导致高的风险溢价。^②不过,令政府官员困扰的是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民主悖论。如印尼财政部长Muhammad Chatib Basri以该国最近推进的减少能源补贴的改革为例,指出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民主困境。改革过程是即时的,而改革收益只能在中期才能得以实现,然而民众不会理解这些。^③

2. 其他提振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

除了讨论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学者们也探讨了其他应对长期经济停滞的治理手段。Sumner(2014)指出仅通过传统货币政策已经不可能在金融稳定的同时实现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振经济增长的治理思路不仅需要进一步降低实际利率,而且需要通过增加投资、减少储蓄来增加需求。^④类似的讨论在2014年IMF—世行年会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题为“公共债务、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会议上,IMF副总裁筱原尚之(Naoyuki Shinohara)指出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就是基础设施瓶颈,并认为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因此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非常有益的。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虽然认同在合适条件下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好建议,但他更关注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选择。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挤出其他重要领域如教育和研发的投资。^⑤Ortega & Peri(2014)发现开放移民制度对于人均收入有长期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开放贸易制度对人均收入则没有显著影响。其中移民制度主要

① Sachs, Jeffrey D. (201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oject-Syndicate 2015 Nov. 25.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romote-sustainable-development-economics-by-jeffrey-d-sachs-2014-11>

② Findlay, Christopher; Sorescu, Silivia; Dajud, Camilo Umana (2014). Structural Reform Lowers Country Risk. VOX, 2014 Aug. <http://voxeu.org/article/structural-reform-lowers-country-risk>

③ IMF Survey (2014). Panel Debates Moves to Spur Growth, Create Jobs. IMF Survey Magazine: In the News. 2014 Oc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4/new101514a.htm>

④ Summers, Lawrence H. (2014) Reflections on the New ‘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 VOX, 2014 Oct. 30. <http://voxeu.org/article/larry-summers-secular-stagnation>

⑤ IMF Survey (2014). Panel Debates Moves to Spur Growth, Create Jobs. IMF Survey Magazine: In the News. 2014 Oc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4/new101514a.htm>

是通过生产技能的提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较高的创新率。^①

三、全球经济治理之货币金融治理

(一) 全球金融资本的发展与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政治与法律现象。李国平和周宏（2014）认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主权会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引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因此如何充分利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同时维护金融主权，是现阶段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② 世界经济结构的固有矛盾是经济与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李辉等（2014）提出了关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新理论：“帝国的光环”理论。他认为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其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但同时也增加了在大萧条后建立金融监管体系的压力。大量的外资流入以及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最终导致整个美国经济结构过度金融化，进而引发了金融危机。^③

金融危机包括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其中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进出口市场均是危机形成和传导的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Bigsten & Munshi（2014）建模研究了全球化和房价泡沫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泡沫并不会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发达国家中出现。相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泡沫更可能出现在金融发达的开放经济体。但只有当泡沫和房地产结合在一起时，房价才随着全球化的增加而上涨。^④ Lothian（2014）文章讨论了在两次金融危机之间和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发现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产出波动、通货膨胀和货币增加之间存在强正相关性。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之间同向波动，而且这两者会随着货币增加的变化而出现变化。换言之，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部分源于过去五年中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货币供给波动。^⑤

康立、龚六堂（2014）考察了国际经济危机是如何通过影响一国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而导致该国出现银行净资产损失，并最终加速传导给该国非贸易部门的过程。该研究对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建模。研究结果显示：当存在金融摩擦时，来自一国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冲击能够更显著地传导至该国非贸易部门。而该国政府合理的信贷政策能够一

① Francesc Ortega, Giovanni Peri (2014). Openness and income: The roles of trade and mi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2), 231-251.

② 李国平、周宏（2014）：“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

③ 李辉、唐世平、金洪（2014）：“帝国的光环：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

④ Bigsten, Arne; Munshi, Farzana. (2014). Globalisation and Inter-occupational Ine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y*, 37 (3), 501-10.

⑤ Lothian, J. R. (2014).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twin c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49, 197-210.

定程度上缓解冲击的传导。^① 为了量化金融冲击的影响和传导机制, Alpanda & Aysun (2014) 估计了一个加入了信贷市场摩擦性要素的两地区开放经济 DSGE 模型。该模型结果显示, 当只考察基准模型时, 无法合理解释美国和欧元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但是, 如果加入了金融冲击, 则各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大大提高。^②

(二) 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与现实状况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单向、双向或多向流动。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 资本流动变化给相关国家带来的经济冲击也愈加显著。自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资本流动急剧增加, 其中大部分源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交易增长。Evans & Hnatkovska (2014) 建模研究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如何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回报的行为。建模结果显示,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在金融一体化早期阶段相对较大而且极不稳定, 其国际资产交易主要体现为债券交易。1975 年至 2007 年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 为了更好地促进风险分担, G7 国家的国际债券流动规模和波动性出现了下降。^③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前期和后期, 资本流入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其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之后资金流动对利差更加敏感。此外, 美国经济及其货币政策也对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有显著影响。Ahmed & Zlate (2014) 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和利息差以及全球风险偏好是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决定因素。^④ 通过对过去 10 余年间 52 个经济体面临各类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 张明、肖立晟 (2014) 发现: 新兴市场经济体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本国经济增长率, 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全球风险偏好与美国经济增长率; 而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本币的汇率变动, 外部因素是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期, 利差与经济增长率对发达经济体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将变得显著。^⑤

全球流动性状况体现了货币政策中货币供给和短期利率所无法包含的其他信息, 因此全球流动性状况也会限制一国货币政策影响国内名义和实际变量的能力。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可能会引发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 因而成为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严峻考验。Burns 等 (2014) 的研究表明, 相较资本流入量不变的基准情境, 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将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量减少约 10%, 即到 2016 年资本流入量占发展中国家 GDP 比重会下降 0.6%。但是, 如果金融市场过度反应, 则可能出现资本流入降幅高达 80% 并持续数月的局面。因此, 发展中国家货币当局亟待制定应急预案应对全球金融环境骤然紧缩的

① 康立、龚六堂 (2014): “金融摩擦、银行净资产与国际经济危机传导——基于多部门 DSGE 模型分析”, 《经济研究》, 第 5 期。

② Alpanda, S. & Aysun, U. (2014).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shocks in an estimated DSGE mod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47, 21 – 55.

③ Martin D. D. Evans, Viktoria V. Hnatkovska (2014).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returns and world financi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1), 14 – 33.

④ Ahmed, S. & Zlate, A. (2014).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 brave new wor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48, 221 – 248.

⑤ 张明、肖立晟 (2014): “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 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世界经济》, 第 8 期。

局面。^① 杨农 (2014) 则指出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 但是短期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内国际因素导致的高利率, 中国的货币政策要协调好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同步性问题。^② 不仅仅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容易遭受全球流动性状态变化带来的冲击, Beckmann 等 (2014) 认为一些大型国家或地区, 如美国和欧洲货币联盟, 也会受到全球货币供给冲击的影响。这一结论与认为仅有小型开放经济体受到国外金融冲击干扰的传统经济理论不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和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吸引了超额国际资本的流入, 由此形成对其货币供给的冲击。^③

(三)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金融监管

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其后的跨境资本流动大幅波动, 引发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治理工具的研究。资本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管制国限制不稳定的资本流动。2011 年 IMF 的报告中更正了之前关于反对资本管制的观点, 认为资本管制可以防御金融危机。^④ 利用 1995 年至 2012 年间 31 个国家流向 76 个主要接收国的双边银行资本流动年度数据以及各国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管制指标, Ghosh et al. (2014) 发现单边或双边的资本账户管制均能显著减少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如果只单独加强资本账户流出的管制, 即金融部门对非本国居民的借贷限制增加, 资本流动将缩减 50—100%。如果仅单独加强资本账户流入的管制, 即对外币相关的审慎措施变紧, 则资本流入将减少 50—80%。如果资本流入国和流出国同时进行管制, 则金融危机之后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将可能会分别减少 10% 和 90%。^⑤

由于各国历史上很少对诸如产出、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短期波动采取资本管制措施, Eichengreen & Rose (2014) 认为任何把资本管制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提议对于货币当局而言都是一个挑战, 需要更加慎重。^⑥ 进一步地, Eichengreen & Gupta (2014) 认为资本管制无法完全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更好的预防措施是采取宏观审慎政策, 即在针对外国资本流入时, 允许有限的汇率升值和贸易逆差。^⑦ Jeanne (2014) 也认为国内实施宏观审慎

① Burns, Andrew; Kida, Mizuho; Lim, Jamus; Mohapatra, Sanket; Stocker, Marc (2014).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Normalization and Emerging-Market Capital Flows. VOX, 2014 Jan.

② 杨农 (2014): “全球资本流动逆转: 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应对?”, 《国际经济评论》, 第 3 期。

③ Beckmann, Joscha; Belke, Ansgar; Czudaj, Robert. (2014).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Shocks for National Policymakers-Rising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Monetary Policies.

④ IMF (2011). Macprudential Polic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IMF Policy Paper.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031411.pdf>

⑤ Ghosh, Atish R; Qureshi, Mahvash Saeed; Sugawara, Naotaka (2014). Regulating Capital Flows at Both Ends. VOX, 2014 Oct. <http://voxeu.org/article/regulating-capital-flows-both-ends>

⑥ Eichengreen, B. & Rose, A. (2014). Capital Controls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48, 1-16.

⑦ Eichengreen, Barry; Gupta, Poonam (2013). Tapering talk: The impact of expectations of reduced Federal Reserve security purchases on emerging markets. VOX, 2013 Dec. 19. <http://voxeu.org/article/fed-tapering-and-emerging-markets>

政策通常要比资本账户管制好,但前者的实施通常遭受更多的限制。^① Mitchener & Wandschneider (2014) 则通过对大萧条时期资本管制的分析,认为资本管制并不能有效地拯救银行业体系,也不能刺激国内产出和提升物价水平,而是更多地被用于限制贸易和偿付外债。^②

作为一种政策选项,资本管制亦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带来溢出效应。Giordani 等 (2014) 发现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会使得资本流向拥有相似经济特征的其他国家。^③ 也有研究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账户管制都会通过资本流动来产生国际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遵从统一的国际规则或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不过在全球需求疲软的环境下,实现国际协调政策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如果各个国家不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那么各国将不会实现各自的目标。该研究认为应该允许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审慎资本管制的尝试,特别是对于巴西这种拥有适度外汇经济规模的经济体来说更应该如此。^④

为了促进国际金融稳定,2006 年开始实施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规制世界各地大型银行交易风险的监管框架。但是,许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仍然出现了重大损失。Alexander 等 (2014) 的研究发现,在巴塞尔框架的约束下,仍有很多银行并未因为其超出其最低资本要求的风险而受到相应的惩罚,说明巴塞尔框架并非是一个促进金融稳定的合理框架。进一步地,该研究讨论了替代巴塞尔框架的新框架,以有效防止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却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的情况出现。^⑤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新特点,万泰雷等 (2014) 认为中国亟待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应对金融话语权缺失、外国政策溢出效应和开放性政策推进带来的各类挑战。^⑥

(四)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大多数文献将目前所处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II”。该体系的演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驱动力量。该体系形成初期仅有美国处于中心地位,1971—1991 年期间该体系由欧洲和日本等外围国家驱动,90 年代以后欧元加入美元共同成为中心货币,随后中国成为驱动该体系的外围国家,下一个驱动力量可能来自印度。^⑦

在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依旧保持主导地位,其最明显的标志是美元一直是国际石

① Jeanne, Olivier (2014).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IMES Discussion Paper No. 2014 - E - 1. <http://www.imes.boj.or.jp/research/papers/english/14-E-01.pdf>

② Mitchener, Kris James; Wandschneider, Kirsten (2014). Great Depression Recovery: The Role of Capital Controls. VOX, 2014 Aug. <http://voxeu.org/article/great-depression-recovery-role-capital-controls>

③ Giordani, Paolo; Ruta, Michele; Weisfeld, Hans; Zhu, Ling (2014). Do capital controls deflect capital flows? VOX, 2014 June. <http://voxeu.org/article/do-capital-controls-deflect-capital-flows>

④ Jeanne, Olivier (2014).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IMES Discussion Paper No. 2014 - E - 1. <http://www.imes.boj.or.jp/research/papers/english/14-E-01.pdf>

⑤ Alexander, G. J., Baptista, A. M. & Yan, S. (2014). Bank reg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A case against the 2006 Basel framework for controlling tail risk in trading boo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43, 107 - 130.

⑥ 万泰雷、李松梁、黄鑫 (2014): “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及中国参与路径”,《国际经济评论》,第 3 期。

⑦ Folkerts-Landau, David; Garber, Peter M. (2014).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s First Dec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54. <http://www.nber.org/papers/w20454>

油市场中的记账单位货币和支付媒介货币。但是美元主导的现状正在发生改变。例如 Chitu 等 (2014) 的研究指出即便在石油这样同质性极强的市场中, 也存在着使用多种国际货币的空间。在二战后全球石油交易中, 美元支付占到全球石油进口支付总额的 31%, 非美元支付比例为 23%。其余部分 (46%) 缺乏支付货币的信息,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进口并未使用美元支付。^① Otero-Iglesias & Zhang (2014) 认为, 欧洲一直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欧货币合作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美国不愿参与或支持任何一种涉及货币改革的谈判。^② 寺田贵、王雅琦 (2014) 的研究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小多边框架 (如金砖五国和东盟 10+3 合作) 来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强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小多边框架即由少数有相似想法的国家结成同盟, 以实现共同利益或者建立合意的规则体系。^③ 如果人民币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对解决国际储备货币供给难题、维持国际储备货币偿付能力和币值稳定以及最终维系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④ 在“多核心货币区”和“区域核心货币”的概念基础上, 曹彤、赵然 (2014) 运用汇率内在形成机制模型和动态面板技术分别对马克货币区和东盟货币区的主导核心货币进行了分析和比对, 发现两个货币区均呈现多核心货币主导。影响东盟地区核心货币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是核心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和与核心货币发行国的贸易依存程度, 2012 年人民币在东盟地区核心货币中的平均权重为 34%, 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超过日元的中度核心货币。^⑤

国际货币秩序的不公平和美元是否存在过度特权一直都是争议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美元的过度特权价值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剪羊毛”行为实现的, 集中体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丁志杰和谢峰 (2014) 测算了 1986 年美国成为债务国后获得的巨额国际经济利益, 提出通过发展南南合作建立区域性、集团性治理来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的治理变革。^⑥ 基于新开放经济分析框架, 范小云等 (2014) 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规模, 此外储备货币国家的偿付能力增长率不能低于非储备货币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和储备货币的实际收益率。^⑦ 进一步地, 运用静态和滚动的 Pearson、Spearman 相关系数法, 汤凌霄等 (2014) 证明新兴大国外汇储备波动具有协动性且日趋增强, 因此新兴大国应加强外汇储备合作。该协动性是国际冲击因子和新兴大国特征因子的共同作用所致, 不过这两个因素对于不同国家的影响程度不同。^⑧ 金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外汇储备盈利需求的结

① Chitu, Livia; Eichengreen, Barry; Mehl, Arnaud (2014). One or Multiple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Evidence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Oil Market. VOX, March. <http://voxeu.org/article/there-room-more-one-international-currency>

② Otero-Iglesias, Miguel; Zhang, Ming. (2014). EU-China Collabor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uch Ado about Nothing? *The World Economy*, 37 (1), 151 - 68.

③ 寺田贵、王雅琦 (2014): “中国的全球金融抱负: 小多边框架”, 《国际经济评论》, 第 1 期。

④ 范小云、陈雷、王道平 (2014): “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世界经济》, 第 9 期。

⑤ 曹彤、赵然 (2014): “从多核心货币区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金融研究》, 第 8 期。

⑥ 丁志杰、谢峰 (2014): “美元过度特权、经济暗物质与全球治理变革”, 《国际金融研究》, 第 11 期。

⑦ 范小云、陈雷、王道平 (2014): “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世界经济》, 第 9 期。

⑧ 汤凌霄、欧阳晓、皮飞兵 (2014): “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波动的协动性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研究》, 第 1 期。

合,促成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汤凌霄等(2014)认为金砖新发展银行作为转型中的新兴大国的金融合作机构,在总体上仍需遵循市场规则和国际规则,但也需要选择一种依托政府和市场的适宜性机制,建立低成本的中长期融资管理机制。^①

四、全球经济治理之贸易投资治理

(一) 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前景与存在的问题

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全球化贸易对象主要是商品,尤其是最终商品。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则是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在全球的流动。这就要求国际贸易治理结构和贸易规则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② Orefice & Rocha (2014)超越了以关税自由化为基础的标准分析模式,从关税优惠重要性和优惠贸易协定的普遍性角度,指出日益增长的国际生产网络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③ 东艳(2014)提出了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认为,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区域贸易规则以及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为基础,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④

1. 针对区域性贸易规则的探讨

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已引起对区域贸易协定的重新关注。目前有三个超级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它们分别是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或东盟+6)、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及由美国和28个欧盟国家组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超级区域贸易协定由于其所涉及的成员国通常具有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因此这些协定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潜质。对于大国而言,美国可以通过其对各大型协定的表态来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而这些协定也将影响未来其他国家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态。^⑤ 这些协定尽管都致力于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但是也具有排他性,并给非成员国带来制度性压力:一方面会间接削弱WTO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非成员国会因为这些超区域贸易协定设定的“甲板清理”目标而直接受到影响。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属于典型的排他性规则。金中夏、李良松(2014)认为,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美国在TPP谈判中推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那么中美双方均会受到负面的影响。^⑥ Karmakar

① 汤凌霄、欧阳晓、黄泽先(2014):“国际金融合作视野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② 金中夏、李良松(2014):“TPP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国际金融研究》,第12期。

③ Orefice, Gianluca; Rocha, Nadia. (2014).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World Economy*, 37 (1), 106-36.

④ 东艳(2014):“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⑤ Whalley, John (2014). Global Mega Trade Deals and the Impact on China. CIGI 2014 May.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commentary_2.pdf

⑥ 金中夏、李良松(2014):“TPP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国际金融研究》,第12期。

(2014) 认为这类超区域贸易协定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只是次优策略, 现有的区贸协定谈判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不完全是良性的。中期来看, 这些经济体有可能不接受新的高标准规则, 而去构建出一个双重的管理制度。^①

2. 贸易协定对贸易活动和经济福利的影响

贸易协定可以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来影响贸易规模, 同时也会影响国家的福利水平。现阶段全球性规则的协议谈判中最重要的三个分别是信息技术协议 (ITA)、贸易促进协议 (TFA) 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ISA)。在信息技术协议 (ITA) 中, 中美已经同意放宽关税; 在贸易促进协议 (TFA), 印度对食品贸易的态度有所缓和;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TISA) 正在稳步推进。如果三个协议都成功签署, 全球总收入预计会增加 2 万亿美元。^② Urata & Okabe (2014) 发现和自由贸易协定相比, 在关税同盟 (CUS) 中许多产品更容易出现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而且多边贸易安排会比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带来更多的贸易创造。^③ 在 Lakatos & Walmsley (2014) 的研究中, 作者探讨了如果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在 2010 年 6 月 21 日签署框架协议会对美国和巴西之间的陆地棉商品争端产生怎样的后果。该研究表明如果在 WTO 框架内解决争端, 则巴西对美国的报复计划对巴西和美国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而且将对世界的总福利也有负面影响。^④

3. 针对贸易协定谈判条款内容的讨论

当今的贸易协定谈判所涉及的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但是贸易协定规则真的需要涵盖贸易相关的所有事务? 比如知识产权、劳工保护等等, 毕竟已经这些专业领域都有相应的国际组织在进行治理。Lester (2014) 认为简化贸易协定有助于更好地达成重要的贸易目标, 不应继续奉行“全球治理”模式, 而应回到“自由贸易”模式。其他问题可交由相关国际组织处理。^⑤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正在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 李丽 (2014) 认为中国应积极参与与环境产品清单的谈判、低碳领域国际标准及非官方标准的制定, 关注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发展趋势, 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规则条件。^⑥

(二) 贸易增长与贸易合作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全球贸易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 全球贸易出现大幅下滑。2009 年以后又开始逐步恢复, 但是在 2011 年以后, 恢复的势

^① Karmakar, Suparna (2014). Rulemaking in Super-RTA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India. Bruegel Working Paper, 2014 March 10. <http://bruegel.org/2014/03/rulemaking-in-super-rtas-implications-for-china-and-india/>

^② Cimino-Isaacs, Cathleen (2014). Double Win for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Bali. PIIE 2014 Nov. <https://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double-win-trade-liberalization-bali>

^③ Urata, Shujiro; Okabe, Misa. (2014). 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 Product-Level Analysis. *The World Economy*, 37 (2), 267-89.

^④ Lakatos, Csilla; Walmsley, Terrie. (2014). Dispute Settlement at the WTO: Impacts of a No Deal in the US-Brazil Cotton Dispute. *The World Economy*, 37 (2), 244-66.

^⑤ Lester, Simon (2014). Free Trade Deals, or Tools of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Interest*, 2014 Feb 18.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free-trade-deals-or-tools-global-governance>

^⑥ 李丽 (2014): “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财贸经济》, 第 9 期。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头又开始受阻,全球贸易又开始处于下滑周期,2012年和2013年全球贸易的增长率仅为3%。

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既有可能是源于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的周期性因素,也有可能是由于贸易保护或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结构性因素。Boz等(2014)通过建模研究发现,近期全球贸易的衰退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由于在贸易增长减速时期全球价值链贸易相对增长,证实其并非为阻碍全球贸易发展的原因。研究发现贸易保护主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贸易起到了制约作用。^①由于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发达经济体的缩减幅度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加严重,因此有人质疑全球贸易减速是源于新兴经济体带来的竞争威胁。Montalbano & Nenci(2014)采用基于聚类分析的多维分析方法,评估了全球贸易模式中的相似性。该研究并不支持关于全球贸易的竞争威胁来自新兴国家的这一假设,并指出把新兴经济体与世界主要工业化伙伴的“贸易相似”程度作为这两者应属于同一个贸易集团的理由是不充分的。^②

在国家间的贸易合作问题上,地域相邻以及贸易持续时间均被认为是促进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Bahar等(2014)发现如果邻近国家是同类产品的出口国,则该国有超过65%的概率对该类产品进行出口;如果该国有一个在某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邻国,则该国出口这一产品的出口增长将会每年增加1.5%。该研究结论与知识扩散的地域化特征相符。^③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普遍较短,平均时间为4.1年,而且其中48%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不到一年。谭晶荣、童晓乐(2014)的研究发现若初始贸易额越大,则贸易持续时间越久。随着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终止贸易的风险率会明显下降。^④

(三) 贸易失衡:现状与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在流量上得到了改善,但是存量层面的失衡问题仍在进一步恶化,体现为2006年和2013年净债务和债权排名前十的国家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失衡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净债务国。Aslam等(2014)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就有必要在需求面进行一次全球性调整。为了提高风险防御能力,债务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状况,进而缩小失衡规模。^⑤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和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Barattieri(2014)指出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是商品贸易造成的巨额赤字和服务贸易的适度顺差形成的综合结果,而日本、德国和中国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① Boz, Emine; Bussière, Matthieu; Marsilli, Clément (2014). Recent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 Cyclical or structural. VOX 2014 Nov. <http://voxeu.org/article/recent-slowdown-global-trade>

② Montalbano, Pierluigi; Nenci, Silvia. (2014). The Trade Competitiveness of Southern Emerging Economie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hrough Cluster Analysis. *The World Economy*, 37 (6), 783 - 810.

③ DanyBahar, Ricardo Hausmann, Cesar A. Hidalgo (2014). Neighb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Evidence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1), 111 - 123.

④ 谭晶荣、童晓乐(2014):“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

⑤ Aslam, Aqib; Beidas-Strom, Samya; Terrones, Marco E.; Yépez, Juan (2014). Global Imbalances: Whither Now? VOX 2014 Oct. <http://voxeu.org/article/narrowing-global-imbbalances>

该研究说明是各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滞后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客观事实造就了贸易活动的不对称,并进而引起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① McKibbin 等(2014)认为发达经济体财政紧缩和政府债券的支出减少将导致长期债券利率的下降。债券的低收益使得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变得有更有吸引力,因此会改变资本流动方向流入到新兴市场国家。不过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将会改变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平衡水平,并降低全球贸易失衡。^② 通过规模和分散度两个维度的分析,杨盼盼、徐建伟(2014)认为,全球失衡的规模变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存在显著关联,但是全球失衡并未出现向更多国家扩散的趋势,而是始终集中在少数主要国家之间。世界主要国家在其快速成长期间都伴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积累,而逆差国的产生则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货币体系密切相关。^③

(四)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生产与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开放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外包”、“模块化生产”、“离岸就业”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等新型生产模式已经改变了全球生产贸易格局。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与销售、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整个过程。^④ 目前全球贸易中约80%属于跨国贸易。跨国贸易中的生产活动既发生在企业内,也发生在企业间;既有区域内分工,也有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合作。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新贸易模式下的国家角色。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大多为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而关于这种生产与销售模式所带来的关于国际经济治理理论思考的研究则相对不足。Neilson 等(2014)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近年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然而全球价值链或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全球经济中不同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实证研究。^⑤

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贸易地位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不仅有助于在生产环节中引入竞争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生产效率,同时也给了那些只在某个生产环节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利用欧盟提供 WIOD 数据库, Timmer 等(2014)的研究指出中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

^① Alessandro Barattieri (2014). Comparative advantage, service trade, and global imbala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1), 1-13.

^② McKibbin, Warwick J.; Stoeckel, Andrew B.; Lu, YingYing. (2014). Global Fiscal Adjustment and Trade Rebalancing. *The World Economy*, 37 (7), 892-922.

^③ 杨盼盼、徐建伟(2014):“‘全球失衡’的百年变迁——基于经验数据与事实比较的分析”,《经济学(季刊)》,第2期。

^④ 金中夏、李良松(2014):“TPP原产地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国际金融研究》,第12期。

^⑤ Neilson, J.; Pritchard, B.; Yeung, H.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1), pp1-8.

已经有所上升,其中中国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的价值创造上升最快。^① 樊茂清、黄薇(2014)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利用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的宏观估算方法研究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演进过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上升,正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中国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贸易发展迅速。^② Timmer等(2014)发现成熟经济体中的企业会将其非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同时将具有战略性和高附加值的功能集中在国内。不过,该研究认为这一生产模式转变产生的效果是中性的,即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会实现产品增加值中资本份额的增加,尽管新兴经济体低技能工人的生产增加值份额会相对有所下降。^③

2. 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技术与投资要求

尽管以跨国生产中间品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提供机会,但其依然存在一定的门槛。Van Biesebroeck & Zhang(2014)认为只有在中间品生产技术已经足够成熟而且具有成本优势情况下,离岸外包生产中间品才是有利可图的,才可能被企业采用。^④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所带来的成本核算。Hajzler(2014)指出,从全球来看,投资于资源开采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相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出现被投资所在国没收的风险。然而,虽然这类风险存在,资源开采行业仍然占据了外商投资企业所投资行业的大部分比例。^⑤ 国际生产分割条件下,杨珍增(2014)指出,如果跨国公司较高比例的复杂生产任务置于东道国完成,则当地的模仿者能够获得较多的生产信息;然而如果模仿难度较低,则跨国公司会受到更多来自模仿者的威胁。东道国可以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阻止模仿者进入,为跨国公司将更大比例的复杂生产任务置于东道国创造条件,从而提升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⑥

五、其他重点领域的研究

(一) 气候与环境治理的主要进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提高,各国都越来越关注气候问题。作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气候治理不是单一国家或者单一经济体能够独立实现的,它需要各方的合作和共同的能

^① Timmer, Marcel P.; Lashitew, Addisu A.; Inklaar, Robert (2014). The Role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GDC Research Memorandum GD - 143,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② 樊茂清、黄薇(2014):“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世界经济》,第2期。

^③ Timmer, M. P., Erumban, A. A., Los, B., Stehrer, R., & de Vries, G. J. (2014).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2), 99 - 118.

^④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Lijun Zhang (2014). Interdependent product cycles for globally sourced intermedi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1), 143 - 156.

^⑤ Christopher Hajzler (2014). Resource-based FDI and expropri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1), 124 - 146.

^⑥ 杨珍增(2014):“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力。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谢富胜等(2014)重建了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范围的行动,而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将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①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既有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两个角度对该机制的变迁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和运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薄燕和高翔(2014)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的变迁基本上是属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下,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累积和规则变化。过去强调该机制应建立在“有差别责任”或者“不对称的承诺”的基础上。但2009年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努力下,这种不对称性在逐步缩小,“共同性”得到了增强。^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董亮和张海滨(2014)分析了IPCC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四个主要路径,即政策创新、政策扩散、政策选择和政策坚持。作者认为IPCC作为气候变化的认知共同体,也存在着一些如科学专业精神不足、组织机构运行效率不高等影响其发挥作用的限制性因素。^③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国际政策协调与谈判需要大量相关的数据与信息支持。闫云凤、赵忠秀(2014)将全球分为G7、BRIC和其他国家三个区域,建立了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各区域的消费碳排放及碳溢出效应。文章认为,消费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建立对于国际气候谈判日益重要,这种核算体系有助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碳排放责任,从而改变全球消费模式,进而有助于减排。^④ 尽管在21世纪的前11年,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Garnaut(2014)认为中国已着手实施坎昆2010年会议承诺^⑤,中国更加强调收入分配、消费和服务的公平性的经济增长新模式,使得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中国对低碳排放技术的大规模部署,也将降低世界范围内的低碳经济转型成本。^⑥ 借鉴人类发展指数,李晓西等(2014)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两大维度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该指数以12个元素指标为计算基础,测算了123个国家绿色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序。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理念与测算方法,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⑦ 发达国家的消费侧资源环境负荷普遍高于其生产侧资源环境负荷,而发展中国家恰好相反。如果从消费侧资源环境负荷指标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仍在不断加强。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环境服务净出口,即存在突出的“南北资源环境负荷转移”问题。发达国家生产侧人均资源环境

① 谢富胜、程瀚、李安(2014):“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② 薄燕、高翔(2014):“原则与规则: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

③ 董亮、张海滨(2014):“IPCC如何影响国际气候谈判——一种基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

④ 闫云凤、赵忠秀(2014):“消费碳排放与碳溢出效应:G7、BRIC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

⑤ 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

⑥ Garnaut, Ross(2014). China's Role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2(5), 2-18.

⑦ 李晓西、刘一萌、宋涛(2014):“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负荷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地区），而消费侧人均指标的差距更加明显。换言之，发达国家消耗和占用了更多的全球资源与环境空间。^①

（二）对收入不平等治理的关注

以皮凯蒂、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分配与发展的不平等。尽管美国中低阶层的贫穷化与其过度发展的金融产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收入状况因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全面有所改善，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层面的不平等状况。尽管从1988年至2008年全球基尼系数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但是全球的不平等水平依然很高，全球基尼系数水平已经达到70%。如果把全部或大部分失踪收入归结为最高收入的低估^②，那么由基尼系数衡量的全球不平等水平可能会更高。中国低收入人群的减少是近年来全球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力量。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所有中国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位置都提升了，有时这种提升幅度甚至超过10%。^③

贸易的开放程度会对国家跨职业的工资不平等状况造成影响，同时更高的不平等又会更滋生腐败。Bigsten & Munshi（2014）发现贸易开放将加剧低收入水平 OECD 国家的工资不平等状况，但是这种现象在高收入 OECD 国家中并不显著。而且在富裕国家，贸易开放将导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减少。不过，任何发展水平的国家扩大以 FDI 衡量的资本流入对于工资不平等的影响都不显著。^④ Badinger & Nindl（2014）发现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政治权利以及贸易和金融开放衡量的全球化程度等较高则能够显著减少腐败，而自然资源租金较高则会增加腐败。文章还发现一国国内的不平等将导致腐败的增加。^⑤

（三）对科技创新的治理诉求

创新能力与科技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受到更多的关注。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新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本市场以及信贷市场可以为创新型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尽管信贷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会面临枯竭到导致支持效率的下降。^⑥ 欧阳晓、陈琦（2014）对“金砖国家”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与单因素效率进行了全面的测度，并与其他一些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发现，尽管“金砖国家”研发效率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发效率，但是其科技向经济的转化效率则正

① 张文城、彭水军（2014）：“南北国家的消费侧与生产侧资源环境负荷比较分析”，《世界经济》，第8期。

② 考虑到高收入者更有动机和能力实现收入的藏匿。

③ Lakner, Christoph; Milanovic, Branko (2013).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6719, 2013 Dec.

④ Bigsten, Arne; Munshi, Farzana. (2014). Globalisation and Inter-occupational Ine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y*, 37 (3), 501 - 10.

⑤ Harald Badinger and Elisabeth Nindl. (2014). Globalisation and Corruption, Revisited. *The World Economy*, 37 (10), 1424 - 40.

⑥ Altomonte, Carlo; Antonielli, Marco (2014). Are Capital Markets the Only Friend of Innovation? Bruegel 2014 Marc. <http://bruegel.org/2014/03/are-capital-markets-the-only-friend-of-innovation/>

在赶超发达国家。^① 基于对金砖五国 2000 年至 2011 年全要素生产率、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测算,李景睿、邓晓锋(2014)发现收入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和前沿技术进步之间呈显著的倒 U 型关系,并与技术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换言之,收入差距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存在着适度性问题。对于金砖国家中的南非、巴西和中国来说,现阶段其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倒 U 型曲线顶点的临界值,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小收入差距,是促进这几个国家国内需求和激励技术创新的关键举措。^② 近年来网络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政府行动的速度却落后于商业和社会发展速度。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已经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程度上都将进一步扩大,然而对于网络的治理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则相对不足。这种既知道存在问题却无法尽快提供解决之策的典型案例体现在为欧盟隐私条款的建设,该条款不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混乱而受阻。对新经济的过度约束还有可能会阻碍创新,并降低下一项重大突破性进展出现的可能。^③

六、结论

以上研究大致勾勒出 2014 年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基本方向和主要观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亮眼表现吸引了学者们对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讨论。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尽管全球经济版图一直在变化,尽管全球经济权力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全球经济权力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现状使得不少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各种行为体,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范式和促进治理效果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上。总体而言,全球经济治理尚未脱离历史留下的痕迹,依然处于西方主导的经济治理时期。这一基本的时代背景亦被充分体现在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投资等重点国际经济合作重点领域中。不仅探讨的问题和对象围绕着发达经济体,而且经济治理的基础理论模型也依然以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为主,例如在经济增长治理中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讨论,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对于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对于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等等。大部分研究中均以自由市场理论作为基本价值观,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等作为理论指导。不过,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和对以往经验的反思,研究中也涌现出不少非传统思想。例如在对过度金融化的担忧、对资本管制态度的改善以及对泛化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质疑等等。

作为一个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新兴前沿学科,全球经济治理属于跨学科的综合型学科。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尚存在几大问题:首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实践的研究和比较相对不足,多数研究依然以西方的经济治理理念作为主要依据;其次,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活动的实践需求,对如全球投资规则问题、数字经济治理等前沿或新兴经济领域的治理研究相对不足;最后,体系化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要么偏重全球治理在国际关系层面的研究,要么专

^① 欧阳晓、陈琦(2014):“‘金砖国家’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与单因素效率评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5 期。

^② 李景睿、邓晓锋(2014):“适度收入差距对需求驱动型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第 4 期。

^③ Bowyer, Charlotte (2014). Technology, Privacy and Innovation in 2014. Adam Smith Institute, 2014 Jan. <http://www.adamsmith.org/blog/media-culture/technology-privacy-and-innovation-in-February-2014/>



注于具体经济议题领域的经济理论研究，尚未出现既能体现全球经济治理理论高度，又能较好结合经济治理实践活动的研究。

中国既是全球经济大国，也是新兴的全球经济治理学主要领导者，亟待得到更多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支持。下一阶段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应努力尝试回答：如何构建既具有全球合法性又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的全球价值规范？如何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经济竞争冲突、提升经济治理能力的根本性制度安排？

（编辑：孙丽丽）